

特朗普回归与大国关系新动向

张宇燕 邢广程 冯仲平 高 飞
戴长征 袁 征 翟东升 田德文

编者按：2025年1月，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标志着美国政治的一次重大转向。执政数月来，特朗普的政策不仅重塑了美国国内政治，更对全球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外交理念，进一步冲击多边主义框架，加剧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中美关系面临新一轮考验；美欧关系因俄乌冲突、贸易争端及价值观分歧等再起波澜；美俄关系戏剧性转圜，但俄乌冲突仍死结难解。总的来说，特朗普的回归不仅关乎美国自身，更牵动着全球权力格局。面对这一变局，各国需在动荡中寻求战略适应，既要防范风险，亦需把握潜在机遇。为此，本刊以“特朗普回归与大国关系新动向”为主题，邀请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展开笔谈，以期深入剖析这一重大议题的全球影响。

特朗普政府回归下的 国际秩序变革与大国关系重构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一级研究员）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标志着国际政治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在

他执政的短短几个月内，一系列政策动向已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产生了系统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国际规范、盟国体系、大国关系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

一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对领土议题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其关于巴拿马运河区、格陵兰岛主权以及美加边界问题的言论，实质上是将领土变更纳入政治交易的范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推动的 30 天停火协议隐含着对克里米亚地位及乌东边界问题的重新安排，这严重削弱了国际法的权威性。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对国际规范的挑战并非“无根无据”，而是与特朗普政府“交易型外交”理念一脉相承，其核心逻辑在于：所有事情都是可谈判可交易的对象，关键在于确定合适的“价格”。

二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体系裂痕加大。欧洲已经意识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尤其是当下的特朗普政府，完全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而牺牲盟友利益。马克龙在演讲中明言，欧洲一如既往地希望美国支持欧洲，站在欧洲一边，但是欧洲也必须做好没有美国的准备。这是当下欧洲心态的集中体现，也说明不信任的种子在跨大西洋联盟中已经种下。这种盟国体系的裂痕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欧盟开始推进自身安全防务能力建设，波兰等国甚至开始探讨发展自主核威慑力量的可能性。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也在重新评估同美国的盟友关系以及新形势下的东北亚局势。尽管说西方世界开始瓦解还为时尚早，但作为统一的政治概念，其内涵已经受到严重侵蚀。

三是大国关系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构。特朗普政府有着鲜明的“交易型”特征。指导思想势必引发大国博弈的一系列变化。在美俄关系方面，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提出不能让中俄走到一起，力图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拆解中俄战略协作。不过，特朗普的这一政策也还面临一些结构性制约，比如俄罗斯在能源出口和工业品进口方面已经同中国建立了紧密联系，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的能源出口对象和工业品来源，而美国难以在这些领域替代中国，从而使得美俄关系改善存在明显上限。但另一方面，俄罗斯领导人也具有一定的交易型特质，强调实力和现实利益。总之，美俄接近的程度及其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在中美关系上，特朗普政府延续了拜登政府时期的一系列对华政策，区别在于变本加厉，而且更具破坏性，具体表现在关税、投资、关键通道和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的持续高强度施压。中长期看，中美两大国终究会开启谈判进程，值得关

注的是美方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提出的利益诉求。特朗普本人对领土、势力范围等有着与以往领导人不同的观念，因而不排除他将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半岛问题等议题作为谈判筹码甚至交易对象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应提前研判，预作准备。

四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撕裂。特朗普依靠行政权力，强势推动国内制度变革，其广度和烈度是美国历史上所罕见的，并由此引发了美国人对其行政权力无限膨胀的担忧。当下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不少“宣誓效忠”甚至“劝进”的乱象。美国现行制度对总统行政权力的制衡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国会通过行使立法权进行约束。鉴于目前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多数席位，总体来看国会的约束比较有限，要到2026年中期选举后才可能发生变化。二是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行使司法权进行约束。从目前最高法院的构成看，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由共和党总统提名，这种局面显然对特朗普有利。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前不久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冻结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付款的决定，这表明共和党内部建制派有着自身利益，并不完全服从特朗普。如果特朗普政府拒不执行最高法院判决，双方的对抗将会导致国内进一步撕裂，甚至引发宪法危机。三是行政体系本身对总统权力的约束。联邦政府内部职业官员并非都拥护特朗普新政，州政府中与特朗普公开唱反调的也不在少数。特朗普本人对此深恶痛绝，怒斥联邦政府内潜藏的“深层国家”对美国国家治理造成危害。不过总体而言，在反复甄别和忠诚度审查之下，行政机构所能发挥的制约作用比较有限。四是社会舆论制约。特朗普回归初期，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高，尽管不同机构的具体结果不同，但一般都能达到五成以上，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将“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其在国内寻求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至少在目前阶段效果尚存。鉴于美国的巨大体量，无论国内形势如何变化，其结果都会对整个国际形势产生影响。

总的来说，特朗普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尚难对其进行完整和精确评估。尽管如此，一些大的态势目前已经浮现出来，那就是，美国长期以来累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不施猛药已难以为继。而由特朗普政府启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最终能够取得何种疗效则尚未可知。可能性之一是，美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加速衰败的历史阶段，其标志性起点就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操作。另一种可能性是在长期的、总体性的下行历史阶段中，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可能出现中短期的复苏，甚至可能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再次展示出活力。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密切关注，做好充分准备。

剪不断理还乱：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透视

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会长)

俄国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在他的《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一书中分析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他认为，19 世纪初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遵循了三种显著模式：第一种模式，与西方各国合作；第二种模式，对西方世界的防御反应；第三种模式，对西方采取强硬政策。但在我看来，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俄罗斯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西方国家进行过战争，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对手与不同的国家结成过同盟。俄罗斯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进行过战争。因此，俄罗斯在心理上并不畏惧与西欧国家进行军事博弈。然而，从长时段来看，俄罗斯并没有找到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成熟方式。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民族是高度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它让人陶醉，也让人失望。在它那里总是可以有一些意外。它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这是一个能够引起西方各民族不安的民族”。从别尔嘉耶夫的判断可以看出，现在的西方人对俄罗斯如此不信任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西方历史学家更是将俄罗斯描绘成扩张成性、粗鲁而野蛮的民族和帝国。在欧洲历史上俄罗斯所扮演的就是使西方各民族“不安”的角色。这种意识的保存是长时段的，固化的，而西方各民族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又反过来强化了俄罗斯与西方各民族对立的情绪。俄罗斯与西方经常性的摩擦、对立甚至战争就像一出出大剧需要固定角色一样，强化着俄罗斯在西方的反面和消极影像。

需要指出的是，在二战以前，俄罗斯与西方的争斗多为俄罗斯占据优势，但自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俄罗斯在与美国的争斗中总是居于下风，在战略上没有赢过美国。冷战的结局是苏联解体，苏联领导的阵营土崩瓦解，而美国则继续保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与华约相对垒的北约不仅没有随华约解体而解散，反而

实施东扩，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经过三十多年才终于痛苦地承认，俄罗斯是冷战的最大的输家。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消化”完苏联原有的“东欧”战略空间后，独联体就成为西方的战略拓展对象，而俄罗斯一直认为这是其“势力范围”和“利益核心区”，自然不能容忍西方染指。

明确地说，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总体上是固化的，大体上是一贯的，对俄罗斯的认知是“不安”、不信任和蔑视（看不起）。但俄罗斯对西方的看法则要复杂得多，表现出矛盾性和多面性。俄罗斯对西方从内心里十分倾心 and 羡慕，承认西方比自己发达，比自己文明，追求靠近西方，甚至向往与西方融为一体。但西方却常常以各种方式拒绝来自俄罗斯的“秋波”，无论是地理上、心灵上还是精神上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这使俄罗斯经常存在挫败感和被边缘化的感觉。于是，俄罗斯对西方就按照逆反原则，不断与西方进行各种样式的“纠缠”，模仿中带有嫉妒情绪，这种情绪再进一步伸展就会出现仇视心理，再加上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深度博弈，俄罗斯经常与西方发生规模不等的冲突。俄罗斯会引起西方各民族“不安”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民族意志深处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独特性，即俄罗斯民族是神选民族，俄罗斯负有特殊使命，俄罗斯躁动的灵魂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加以安放。俄罗斯要与西方融合，但这不能被理解为不发达的俄罗斯“融入”西方。俄罗斯在与西方“融合”过程中要处于主导、支配和主宰地位，而这是西方决不能够容忍的。因此，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多个层面出现长时段的“隔阂”，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俄罗斯与西方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还有一个因素，俄罗斯精英——无论政治家、社会精英，还是文化巨匠常常提及，俄罗斯与西方是不可分割的，俄罗斯与西方原本就是一体，精神是一致的。东正教决定了俄罗斯的灵魂也是基督教的，俄罗斯文化也属于基督教文化圈，与西方是同一种文化和精神属性。但是，这却不能说明俄罗斯与西方在精神上有多么“亲近”。历史事实恰恰表明，俄罗斯与西方精神世界的差距不次于俄罗斯东正教与其他宗教的差别。俄罗斯与波兰同属于斯拉夫民族，但俄罗斯东正教和波兰天主教文化之间的差距和冲突却非常大，甚至是导致两国关系和民众情感疏远的重要因素。如果说俄罗斯与波兰分属东正教和天主教，那么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属于东斯拉夫民族，又同属于东正教，现在两国却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军事对抗。欧洲用什么来弥补不信任？俄罗斯未来与西方会以何种关系模式相处？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苏联东欧剧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观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窗口和视角。在冷战结束后的亢奋期，俄罗斯主动塑造自己的“新思维”和行为方式，主动作出“历史性”选择，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全球视野下，主动与西方文明接轨，出现了对西方的浪漫期和追求期，但这个浪漫期十分短暂。当时人们以为俄罗斯改变了自己的国际容貌，会与西方实现“世纪和解”，欧洲会迎来“大统一”的美满境界。然而，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还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表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又一次进入了新的对抗轮回，这场危机冲突的烈度远远高于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对抗的烈度。

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虽然冷战结束了，但大国冷战思维真的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和改变了吗？从当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看，现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当今世界各大国中，只有中国真正摒弃了冷战思维。冷战的基本结构是由两极世界组成的。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进行了四十多年长时段、高强度、全方位的对抗。中国原属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但因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脱离了苏联阵营，既反对美国霸权，又反对苏联霸权，活生生在世界两大对立的阵营体系中“拱出”一个“角”来，这个“角”不是美国和苏联施舍的，而是中国靠自身努力和抗争赢得的。“中美苏大三角”更多凝结的是中国的贡献和智慧。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先后与美国和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缓和与大国的关系，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不仅摒弃了冷战思维，而且改变了冷战时期的行为模式，将和平与发展视为国际社会的主题，以“融入”的姿态迎接世界全球化。冷战结束后，中国聚精会神谋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02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这八十年间，人类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历了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从目前世界演化的趋势看，后冷战时期大致上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了“后后冷战时期”，或者可以称为“后冷战后时期”。后冷战后时期的最主要表现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障碍性因素，美国将贸易武器化，着力破坏全球化趋势下形成的国际秩序和体系。世界出现了一系列不确定因素，而美国行为本身就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人类走到了十字路口，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但人类的出路总是有的。在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中国的行为、中国的发展成为不确定世界中最大的确定性。冷战结束后，“中美苏大三角”时代也彻底结束了，现实国际格局中的中美俄大国

之间的关系，是三边关系。中美关系处于十分复杂的状态，俄美关系呈巨大波动状态，而中俄关系的不断发展，成为世界大国中最成熟、最稳定和更可预测的大国双边关系。

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现大麻烦的情况下，俄罗斯上上下下出现了“向东转”的响亮声音。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心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与俄罗斯处于东西方之间有关系：“世界历史的两个分支在俄罗斯相遇并发生相互作用，这就是东方和西方，俄罗斯民族不是纯欧洲的民族，也不是纯亚洲的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的‘洲’，是巨大的东西方。它把两个世界联合起来。在俄罗斯心灵中总是有两个原则在斗争，东方的原则和西方的原则。”俄罗斯地处欧亚腹地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俄罗斯必须兼顾东西方两端。

当今世界很乱，但人类总归要回到共同回应人类命运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个主题上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重要的现实选择。中国最需要做的，恰恰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国是世界舞台上的侠客，则必须同时在剑和剑法两个层面下功夫，借用《周易》之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国若是“大人”，就需要而且必须学会并习惯与当今世界上的“鬼神合其吉凶”，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特朗普 2.0” 冲击下的欧美关系走向

冯仲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特朗普 2025 年 1 月 20 日重返白宫后将矛头对准欧洲，令欧美关系骤然全面趋紧。跨大西洋关系生变必将牵动大国关系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并对国际格局演变产生重大影响。202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战后欧美之间虽也发生过争吵和矛盾，但总体上一直比较稳定。冷战结束后，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得以维持，并经受住了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冲击的考验。随着目前“特朗普 2.0”的开启，欧美发生深刻裂痕，双方关系走向备受关注。

（一）“特朗普 2.0”与欧洲发生激烈冲突

如果说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 2016 年特朗普大选获胜没有心理准备的话，2024 年不少欧洲人已经预料到特朗普有可能卷土重来。尽管如此，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对传统盟友欧洲采取的态度立场和政策举措仍令后者震惊不已，欧美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首先，特朗普处理俄乌冲突的做法令欧洲极度愤懑和不安。由于特朗普曾夸口上台后 24 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故俄乌冲突以及由此而展开的美乌、美俄、美欧关系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成为他上台伊始就优先处理的问题。然而特朗普心目中的俄乌冲突与欧洲国家之所想相差千里。很多欧洲人视俄罗斯为其“安全威胁”，俄乌冲突不单事关俄乌两国，而且事关整个欧洲长治久安。然而对于特朗普来说，无论是援助乌克兰还是为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均让美国吃了亏，而这些国家则占了美国的便宜。特朗普之所以竭力施压俄乌实现停火，并要求欧洲承担防务责任，其目的就在于停止美国对乌援助，不再为欧洲安全“埋单”。

其次，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加剧欧美经贸冲突。特朗普之所以重返白宫就很快将矛头指向欧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坚持美国与欧盟存在高达 3 000 亿美元的贸易赤字。然而根据欧盟官方统计，欧盟对美国确有顺差，但并未达到 3 000 亿美元。欧盟最新统计显示，在货物贸易方面，2024 年欧盟与美国的顺差为 1 982 亿欧元，但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对欧盟贸易则一直是顺差^①。尽管特朗普所言与欧盟的统计有较大出入，但美国坚持对欧盟加征高关税。3 月 12 日，美国对包括欧盟产品在内的所有进口钢铝产品征收 25% 关税正式生效。欧盟同日宣布，决定对价值 260 亿欧元（约合 283 亿美元）的美国输欧商品征收反制关税。随着 4 月 2 日美国宣布对欧盟加征 20% 的对等关税，欧美贸易冲突进一步加剧。

再次，特朗普政府的民粹主义理念和主张与在欧洲占主流的建制派的价值观发生激烈碰撞。长期以来，欧美既是军事同盟，也是所谓价值观共同体。但随着

^① 目前欧盟统计局尚未提供 2024 年欧美服务贸易数据。2023 年欧美货物贸易中，欧盟的顺差是 1 566 亿欧元，服务贸易中美国的顺差是 1 086 亿欧元。详见“EU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acts, Figures and Latest Developments”.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united-states_en, 访问时间：2025 年 5 月 1 日。

特朗普重返白宫，特朗普代表的反建制的美国与目前总体上由建制派所把持的欧洲政坛之间出现了一道价值观鸿沟。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在言论自由、移民等方面的猛烈抨击，以及马斯克对德国、英国、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选举等进行的公开责难，暴露了战后以来欧美之间罕见的价值观差异。在万斯看来，欧洲面临的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等外部势力，而是欧洲自身内部对其“最基本价值观”的背离^①。万斯的讲话震惊了欧洲主流政界和舆论界。英国《卫报》刊文指出，万斯的讲话表明，跨大西洋鸿沟正在加深，美欧不仅仅是对俄罗斯持不同看法，还在价值观和民主等更深层次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②。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则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视欧洲为对手，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运动^③。

（二）“特朗普冲击”对欧美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欧洲火力全开，由此产生的“特朗普冲击”对欧洲国家的内政外交以及欧盟的发展构成了严重挑战。欧美关系未来发展虽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双方相互疏离的可能性将增大。

其一，欧美军事同盟的基石发生动摇，跨大西洋关系陷入严重的战略互信危机。“特朗普 2.0”对欧洲国家产生的最大冲击集中在欧洲安全上。安全、集体防卫一直是欧美传统盟友关系的基石。战后 80 年，欧洲国家的安全保障是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提供的。虽然北约是冷战的产物，但其并未因冷战结束而解散。这意味着，作为外部力量的美国，不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之后一直在欧洲安全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冷战时期欧洲对美国可信度的怀疑虽时有发生，但总体上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与美国保持了相互信任和团结。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余年，欧美

^① Alex Marquardt, Christian Edwards, Steve Contorno and Michael Williams, “Vance Turns on European Allies in Blistering Speech that Downplayed Threats from Russia and China”. <https://edition.cnn.com/2025/02/14/europe/jd-vance-munich-speech-europe-voters-intl/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30 日。

^② Patrick Wintour, “JD Vance Stuns Munich Conference with Blistering Attack on Europe’s Leaders”.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feb/14/jd-vance-stuns-munich-conference-with-blistering-attack-on-europes-leaders>, 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30 日。

^③ Carl Bildt, “The Transatlantic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europe-nato-transatlantic-world-may-never-be-the-same-by-carl-bildt-2025-03>, 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30 日。

同盟经受住了包括 2003 年因美国出兵伊拉克而产生的彼此对立、奥巴马总统开启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北约脑死亡”等严重考验。然而，特朗普二度执政以来美国绕开乌克兰和欧洲盟友与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决议”、威胁不再援助乌克兰和为欧洲国家提供安全保护，让欧洲对是否还能够依赖美国产生了严重怀疑。总之，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和对俄罗斯的态度令欧美同盟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其二，欧洲国家被迫加紧商讨独立防务建设，战略自主有望步入落实阶段。自特朗普重新执掌白宫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之间及欧美之间展开了数十年来少有的密集外交活动。这些外交磋商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而展开：一是如果美国放弃支持乌克兰，欧洲是否继续援乌；二是俄乌一旦停火，欧洲国家在未来乌克兰安全中将扮演何种角色、是否应该派维和部队进驻乌克兰；三是欧洲国家如何承担起保护自身的责任。可以看出，欧洲国家所商讨和探究的根本性问题是欧洲自身的重新定位问题。二战结束以来，欧洲逐渐将自身定位为“贸易超级大国”、经济一极、规范性力量、“后现代”国家。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欧洲已开始面临自身定位困境。2019 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其首个任期刚开始便提出要将欧盟打造成为一支“地缘政治力量”，欧盟领导人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不久发表的《凡尔赛宫宣言》则声称欧盟要扮演欧洲安全的提供者。目前，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启，欧盟意识到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的时刻已经到来。“重新武装欧洲”“欧洲在动员”，连同“战略自主”一时间成为欧洲政界、战略界最为流行的热词。欧洲多数国家领导人决定，即使美国停止支持乌克兰，欧洲国家也将继续力挺乌克兰。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所谓志愿者联盟考虑在俄乌停火后在乌克兰部署欧洲维和部队。最为值得重视的是，2025 年 3 月 6 日，欧盟各国领导人举行特别峰会，一致同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重新武装欧洲”的一揽子计划。3 月 19 日，欧盟公布了《欧洲防务白皮书》以及《欧洲重新武装计划》。这一被称为历史性共识的计划，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欧盟计划筹集 8 000 亿欧元来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其中包括向成员国提供 1 500 亿欧元的贷款，专门用于成员国国防支出，同时欧盟将尽快启动《稳定与增长公约》有关豁免程序，从而“允许成员国在不触发过度赤字程序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于 3 月通过《基本法》修正案，旨在放宽“债务刹车”条款限制，允许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德国候任总理默茨表示，

德国必须从根本上重塑其安全安排，结束对华盛顿长达数十年的依赖^①。

其三，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战后数十年来形成的欧美传统同盟正在经历重大结构性重塑。所谓不确定性，包括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能够走多远，特朗普执政四年之后美国内外政策是否会转向，以及欧洲的战略自主是否会虎头蛇尾、半途而废等。从目前来看，欧洲很多人相信“美国已变”，即使将来特朗普不在台上，美国的对欧政策也不会回到过去。目前欧洲战略自主意愿被重新激活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这说明未来欧洲对美依赖性减少、自主性增大将成为欧美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如此发展下去，欧美同盟内部的结构以及支撑同盟大厦的支柱将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尽管欧洲国家不希望北约解散，特朗普或许也不会宣布美国“脱北”，但长期来看，北约作为连结跨大西洋两岸有力纽带的地位和作用将呈现不断弱化态势。对于欧洲来说，其战略自主不仅意味着要艰难应对欧美关系之变，还意味着要独立思考如何与其最大邻国俄罗斯相处，以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何加强合作。

特朗普回归与中美关系新动向

高 飞

（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2025年1月特朗普以强势姿态回归，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冲击。然而，今夕非同往日，与八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一）当前国际关系出现三个变化

一是国际秩序的“多极化”。“多极化”这一概念强调权力特性，历史上多

^① Anne - Sylvaine Chassany, Laura Pitel and Olaf Storbeck, “Germany’s Election Winner Pledges ‘Independence from US’”. <https://www.ft.com/content/a87d5ebd-1dd9-44ad-a88d-693136a6cfb1>, 访问时间：2025年4月29日。

极、单极、两极格局均曾出现过，但“多极秩序”因无法证明其比单极世界更和平而一度成为小布什政府抨击的重点。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把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手中的旗帜，通过国际机制维护其全球制度霸权。特朗普上台后，强化单边主义，美国对外政策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重归权力政治。国际格局呈现出美国“一超”，中美“二元”和世界“多强”共存、复杂竞争的特点。

二是理念层面的“对立化”。当前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各种思潮对立化现象愈发明显，在美国政治中表现尤为突出。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国家治理和文化理念上存在显著差异，其背后的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社会对立是根本原因。从本质上说，伴随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的原始情感、传统的治理手段和技术进步之间的鸿沟被不断拉大，认知差距也由此扩大。这种超越因果推论的非线性发展推动国际关系由复杂系统向复杂性系统演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博弈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常态。

三是国家间“相互依存武器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会促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然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合作的必要前提是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在缺乏基本信任的背景下，相互依存度越高，彼此之间的威胁反而可能越大。因此，当前出现了一种现象，即中美之间相互连接、联系紧密的领域，反而变成了彼此伤害的工具和打压对手的武器。新形势下，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已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二）中美结构性矛盾没有改变

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是“结构性矛盾”，是全球化进程中权力转移的产物。从 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西方国家就陷入了“历史决定论”的范式假定，即大国间的争霸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将在亚太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并进一步谋求全球霸权。进入新世纪，美国政府从传播“中国威胁论”的认知，推动“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强化权力制衡，到 2017 年、2022 年两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最终将开展对华竞争塑造成跨界认同和超党派共识。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逻辑来看，特朗普回归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和遏制政策。

就现状而言，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脱钩现象。在贸易合作领

域，过去中美曾长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但目前中国在美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已经下滑至第四位。在经济领域，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比逐渐减少，而中国也相应地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这种变化反映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调整。在公共交流领域，中美双方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都在大幅下降。在物理连接层面，中美也存在长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脱钩的现象。据美国电信地理调研公司统计，2024 年仅有最后 3 条海底电缆处于建设中，而 2025 年之后，中美之间已无新开工的海底电缆项目计划。同时，疫情之后，中美之间的航班恢复情况也远滞后于其他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正常交流。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战略目标

特朗普第二任期与八年前存在显著差异。从本次选举结果来看，特朗普不仅赢得了选举人票，还赢得了普选票，表明美国社会层面政治文化已经从自由主义向国家保守主义大幅转向。从政策走向来看，美国新政府呈现国内政治清算与对外战略收缩并举的特点。

一是聚焦内政改革。所谓“内政改革”名义上是提高政府效率，实际上是政治清算，特朗普认为阻挡他政治抱负的人需要被清除。具体而言，由马斯克组建的政府效率部（DOGE）在美国政府中大幅裁减人员，美国现有约 430 个政府部门，其长远目标是将部门数量削减至 99 个，这意味着大量的政府雇员将被裁减。同时，一些部门将面临更大幅度的裁撤，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之音（VOA）等机构。与拜登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并不在意价值观外交与意识形态传播，更多关注关税政策、贸易逆差等问题，其政府层面的主导意识形态工具未来一段时间将面临去功能化，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矛盾或将有所缓和。

二是退出多边机构。美国开始退出国际组织，特朗普坚信现行的国际体系限制了美国的发展，希望摆脱全球治理的制度性约束，这一行为显示出美国重归单边主义的倾向。这种“责任收缩”带来的弊端在于，美国开始在全球众多治理领域和规则制定领域放弃领导角色。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失灵主要来自于大国的权责缺位，即美国主动放弃履行国际责任、提供公共产品，新兴大国短期又难以填补当前的治理空白，导致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加剧。

三是关注关税政策。与拜登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其典

型政策举措是“对等关税”政策。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对全球贸易伙伴施加对等关税政策，严重冲击了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体系，不仅严重削弱美元霸权的信用基础，也将加速世界的多极化进程。从美国自身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当前美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货币地位与货币体系的二元悖论，维护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支撑了美国的世界霸权，但是美元的高估值又削弱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了美国经济的空心化。美国从国际公共品的提供者到依托手中的权力进行国际“寻租”，以高关税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无异于放弃美国多年打造的霸主地位和大国形象，对国际秩序造成毁灭性影响。

（四）中国外交的挑战与机遇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在这一大变局和大乱局中，中国既面临巨大挑战，也迎来了更大的机遇，这要求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利己则达人，只有自身实现良好发展，才能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在新时代、新格局下，中国要紧扣推进现代化这个主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制度层面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环节，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可持续发展、新科技发展与治理等问题上为国际社会提供借鉴。

二是为全球化注入内生动力。中国坚持全方位制度型开放，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不断推动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发展，为全球贸易提供稳定增长预期。据《共建“一带一路”白皮书》统计，中国已与 18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23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当地创造了超过 33 万个就业岗位。世界银行预测，到 2030 年，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投资有望使共建国家 760 余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 200 余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三是改革和完善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美国退出全球治理体系要求中国尽快提升能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并通过多边合作对冲风险。其一，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其二，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性需求和发展导向出发，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其三，以新疆域治理为契机有效推进治理实践，努力把新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平台，而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确保新疆域开发有法可依，公平惠及每个国家。

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大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国际体系的发展完善紧密相联。特朗普回归既是冲击和考验，也是检验中国发展和强国建设的机遇，把握好这一机遇，中国将为国际体系秩序的重塑作出更大贡献。

大国竞争新态势与世界政治未来走向

戴长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本是世界政治的正常现象，但少数大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追求引起的国家间互动构成了世界政治的悲喜剧。大国竞争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典型特征，驱动世界政治走向新的未来。深刻认识大国竞争的本质与新特点是观察世界政治未来走向的理论与现实需要。

(一) 大国竞争的本质和新特点

1. 大国竞争的本质

世界大国和主要文明体是主导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关键力量。尽管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政治的“全球政治觉醒”愈发显著，新兴市场国家、中等强国与“全球南方”具有摆脱被体系主导大国支配命运、参与塑造国际秩序的强烈动机，但大国仍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是国际秩序构建、发展与重塑的主角^①。大国是由能力定义的^②。正如肯尼斯·华尔兹所说，在一个无政府的自助体系中，国家使用综合能力来服务于自身利益^③。从体系层次而非国家层次来看，大国相对于其他类型国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大国能够主导国际秩序的构建、发展与变革，其他类型国家经常处在大国秩序的阴影抑或

① 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

② Jack Levy, *War and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 - 1975*,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 11 - 19.

③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79, p. 131.

庇护下。以 2017 年美国提出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为标志，美国对华政策进入围堵与打压阶段，中国被迫反制。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则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可以说，大国竞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典型特征。

大国竞争既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结果，也是其动因。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获得了“单极时刻”^①。美国把跨区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向全球^②，想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西式民主国家，同时促进经济开放，广泛地传播自己的价值观^③。随着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经济实力增强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寻求改革旧有国际秩序，又催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则极力护持自身的秩序主导地位，使大国竞争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结果。而大国竞争在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能源格局、力量对比格局等变化的同时，也由于西方提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脱钩”“去风险化”等概念，引起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重塑。可以说，大国竞争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动因。

2. 大国竞争的新特点

以特朗普再次当选为标志，大国竞争进入新阶段，呈现出新特点，势必给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带来巨大影响。一是大国竞争的激烈性、复杂性和联动性对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的冲击震荡前所未有，世界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动“全政府对华战略”^④，拜登政府时期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推动亚太联盟网络化，构建对华围堵的小多边机制^⑤，使大国竞争向军事安全领域拓展，增强了大国竞争的激烈性。大国竞争又基于业已形成的相互依赖而呈现

①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America and the World*, Vol. 70, No. 1, 1990/1991, pp. 23–33;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0, 2002/2003, pp. 5–18.

② 蔡拓、张冰冰：《从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辨析与反思》，载《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7 期。

③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 页。

④ 刁大明、马嘉帅：《美国对华战略的“全政府”方式：概念、逻辑与现实》，载《当代美国评论》2021 年第 2 期。

⑤ Thomas Wilkins, “A Hub – and – Spokes ‘Plus’ Model of us Alliances in the Indo – Pacific: Towards a New ‘Networked’ Design”, *Asian Affairs*, Vol. 53, No. 3, 2023, p. 457.

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同时，其联动性也出现新变化。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开启后，向俄罗斯示好，尝试解决俄乌冲突问题^①，并在西半球寻求建立势力范围^②，使中美俄三角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由于世界已经连为一个整体，相较于历史上的大国竞争，这一轮大国竞争将更为深刻地影响国际新秩序构建与世界政治的未来走向。

二是大国博弈竞争场域将空前拓展延伸，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意识形态等广泛纵深领域。这种全领域的超限战是此前大国竞争博弈所少见的。当前的大国竞争不仅影响世界政治的各个领域，而且导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冲突明显回归。以数字技术提升为标志，“第四次科技革命”对大国竞争与国际秩序的影响史无前例。大国竞相提升数字技术能力，进行数字竞争，从而扩展了竞争领域，同政治、经济、军事竞争一起，构成了大国竞争的全领域^③。上述竞争叠加意识形态和制度冲突^④，使大国竞争朝着超越已知竞争边界的超限战方向演变。

三是与上述两条结论相联系，大国竞争的后果也愈发难以预料。建立国际秩序的重要时刻往往出现在大战之后，战胜国着手重建战后世界^⑤。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更迭主要由大国战争驱动，而这一轮国际秩序变革则表现为更多的国际行为体参与，新兴大国、中等强国、“全球南方”均提出了自己的国际新秩序构想，影响大国的国际新秩序构建方案，也影响大国竞争的方式^⑥。大国秩序竞争

① “More Support for Trump Administration’s Pursuit of Peace in Ukraine”.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3/more-support-for-trump-administrations-pursuit-of-peace-in-ukraine/>, 访问时间：2025年4月30日。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Joint Address to Congress”.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3/remarks-by-president-trump-in-joint-address-to-congress/>, 访问时间：2025年4月30日。

③ 戚凯：《ChatGPT与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载《国际论坛》2023年第4期。

④ 樊吉社：《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机理与变迁》，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

⑤ 〔美〕G. 约翰·伊肯伯里：《胜利之后：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建》，严匡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⑥ 参见 Umut Aydin, “Emerging Middle Powers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5, 2021; 涂明辉：《相对制度韧性：新兴大国差异化崛起的内在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5期；戴维来：《中等强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重塑》，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2期；王明国：《从边缘性反抗到结构性重塑：“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载《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5期。

的领域和范围与之前相比空前扩大且相互交织、渗透，而任何一个领域的竞争都会传导到其他领域，增强大国竞争的复杂性。以数字为核心的科技竞争推动大国间数字地缘政治博弈的升级，并对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机制建设构成挑战，进而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竞争的未来格局^①。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也使大国竞争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影响大国竞争因素难以确定，导致大国竞争的未来不再只由大国决定，大国竞争产生的后果也难以预料。

（二）大国竞争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特朗普第一任期与拜登政府时期推动的大国竞争，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现状，而特朗普再次上台将使大国竞争对世界政治未来走向的影响范围更大，程度更深。大国竞争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色彩消退

世界政治将出现自由主义、权力主义、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交叠并存的形式。冷战后，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长期坚持自由主义原则，拓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特朗普浓厚的保守民粹主义风格导致自由主义受到损害，学术界掀起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败的讨论^②。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放弃其价值观以及联盟体系。大多数西方国家仍在坚持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作为国际秩序支撑原则的退潮已不可避免。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地区主义兴起，相应的地区秩序变得更加重要^③。以大国竞争为标志的权力主义复起，加剧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同时，大国竞争还带动民族主义复兴，尤其

^① 张东冬：《数字外交强化与美国全球数字竞争的全新图景》，载《国际关系研究》2025 年第 1 期。

^② 参见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John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Charles L. Glaser, “A Flawed Framework: Wh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 Is Misguid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张建新、董雅娜：《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载《国际观察》2022 年第 6 期。

^③ 参见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唐世平：《国际秩序的未来》，载《国际观察》2019 年第 2 期。

是经济民族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上升^①。由此，国际秩序呈现出类似于马赛克拼图的样貌。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影响下，这种马赛克拼图式国际秩序的特点是不稳定、不平衡和冲突导向，且将持续到出现一种新的稳定秩序为止。该秩序的不稳定性体现在其构成原则容易受到颠覆，且缺乏成型的保障制度和行为规范支撑。不平衡性则体现在大国仍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他中小国家只能通过替代性制度构建平衡大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而大国之间也存在强弱之差。大国竞争导致该秩序向着冲突导向发展，秩序的碎片化较为明显。由此可见，国际新秩序仍需要大国之间及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长期互动才能诞生。

2.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将前所未有地相互连接

大国的国内政治就是国际政治，反之亦然。一方面，大国的国内政治影响国际政治。大国的行为通常与其他类型的国家不同^②，能够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而在大国竞争期，大国通常更倾向于通过影响国际政治来服务国内政治^③。大国的国内政策往往具有外溢效应，即国内政治决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直接影响。例如，拜登政府提出的“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本质上都是通过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政治。可以说，大国国内的政治稳定、政策方向或政治动荡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全球经济和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变化也影响大国的国内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④ 国际政治的变化，如国际冲突、经济竞争、全球治理危机会迫使大国调整国内政策以对冲外部压力或者抓住发展机遇。大国之所以被称为大国，是因为大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国际社会对大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期待也促使大国在国内政治上回应这种期望。大国竞争期间，来自其他大国的经济制裁也会引起国内政治的变化和应对。

① 潘亚玲、肖迅韬：《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结构转型与美对华技术遏制》，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

②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③ [美] 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胡利平、王淮海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对于大国而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塑造。因此，伴随着大国竞争，大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将前所未有地相互连接，大国不仅要注重自身国内政治变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要兼顾国际政治变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3. 全球治理将出现倒退和分裂

大国围绕全球治理的权力、规则与规范之争，打破了大国合作治理的局面，全球治理出现倒退和分裂。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问题全球化，这些问题越来越超越国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随着大国将重心转向竞争，其对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供给减少，一些学者甚至担心可能会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①。全球治理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仅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解决，反而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呈现出日益加剧的迹象。从治理赤字来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兴起，多边主义受到冲击，人类社会面对的全球性挑战也日益突出。从信任赤字来看，大国竞争超越了合作，已经动摇大国之间的信任基础，地缘政治摩擦和冲突加剧，中小国家也对大国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失去了信任。从和平赤字来看，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和平，俄乌冲突久拖未决，巴以冲突蔓延，不仅影响大国关系，还影响地缘政治格局。从发展赤字来看，全球发展失衡仍旧存在，南北差距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动荡难稳，出现更加分裂的局面。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是完善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径，但这一体系受制于大国竞争的影响而出现分裂。中国主张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以金砖扩员、上合组织扩员等方式，助力全球治理体系构建。而美国却执着于构建“小院高墙”，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机制，通过加强双边合作的方式，重振美国的单极治理体系。广大中小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寻求通过替代性制度构建、区域与跨区域制度构建以拓展南南合作，加强在联合国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可以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由于大国竞争已经出现分裂，且短期内难以恢复。

大国竞争是过去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其特点也会随着大

^① 蔡昉：《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伊斯特利悲剧？——全球公共品及其提供方式和中国方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0 期。

国竞争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失效”且难以回到过去，构建国际新秩序成为世界大国与中小国家共同关心的议题。中国向来不主张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常量”而非“变量”。为此，中国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善治。

“特朗普冲击波”与中美关系

袁 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大力实施保守主义举措，推动美国政治光谱加速右转。未来美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将更加保守，经济政策更趋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外政策新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趋于浓厚。“特朗普新政”搅动美国社会，也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给低谷徘徊的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未来的大方向。恰恰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重新回归大国竞争思维，并将中俄视作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商品加征关税。中美双方你来我往，剑拔弩张。2020年特朗普为了赢得连任、推卸防疫不利责任，不惜攻击中国，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任期最后一刻，甚至还想军事打击中国南海人工岛礁，以便制造“十月惊奇”，赢得大选的最终胜利。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所作所为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如自由落体般下坠”^①。

特朗普变化无常的个性和毫无底线的行为模式增加了决策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个人特质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内外政策的制定。特朗普平时言行不羁，复杂善变，自恋型人格所积蓄的强大动能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推崇善于应变的经营谋略，不太愿意墨守成规，不受政

^① 当时美国多位知名学者，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Evan Medeiros）等，都使用了类似表述。

治正确的框框束缚。颠覆传统，寻求突破，赢取掌声和支持，是特朗普追求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团队中不乏对华极端强硬派。外交安全团队中，副总统万斯、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兹、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赫格赛斯和副部长柯尔比等都是对华强硬派，一致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主张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以便从欧洲收缩力量，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纽约时报》社论明确指出，“他们是枪口对准中国的新一班冷战斗士”^①。特朗普经济团队核心是贸易优先的“五驾马车”——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和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均强调关税手段的必要性，支持对内减税和对外加征关税，都将中国视为主要贸易对手。

目前来看，用人唯“忠”是特朗普选用官员的首要标准。特朗普团队内部，或有不同的派系，比如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交易主义派、“让美国再次伟大”派和“新保守主义”派。应该说，这些官员都是特朗普所信任、与其观点大体一致的人士。尽管特朗普刻意在台海问题上模糊立场，也不直接攻击中国领导人，甚至打破惯例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其就职典礼，但这些官员的对华观点也如同棱镜一般折射出特朗普的真实对华立场。

未来四年，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不会改变，中美关系难言乐观。202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要用十年时间“竞赢”中国^②。当前美国国内主流共识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美国政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认知甚至认为，当前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已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放缓，中国科技要“弯道超车”难上加难，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已然拉大。在这种认知下，要想美国改弦更张，至少短期内还颇为困难。

从特朗普首任到拜登政府，再到现在的“特朗普 2.0”，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延续大于变化。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秉承现实主义理念，主张“以实力求和平”，对华极限施压。在认知上，将中国视作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经

^① Edward Wong and Ana Swanson, “Despite a Cabinet Stocked with China Hawks, Trump May Be Cautiou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2024.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October 12, 2022.

贸上，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大幅提高对华关税，减少对华依赖；在科技上，构建“小院高墙”，进一步收紧对华科技封锁，加强对华科技打压；加强中美双向投资的安全审查，进一步限制美国对华投资。2025年2月21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政策指向十分清楚^①。在军事上，“以实力求和平”，继续加强地区军事存在，增强对华军事威慑。在民间交往上，限制甚至阻断中美人文交流合作。

“特朗普新政”的优先次序是由内而外，重点聚焦美国内政，中国议题的紧迫性相对靠后。如鲁比奥所言，“特朗普新政”的外交政策议程始于国内。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兑现选举承诺，打击非法移民。还要对付“深层国家”，清除政府内部反特朗普的势力，打击亲民主党人士。以马斯克为首的“政府效率部”正在大刀阔斧地精简政府机构，开源节流。特朗普重点从国内问题着手，意在消除安全隐患，巩固执政基础，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放在国内，优先解决美国自身问题。而在对外政策领域，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被摆在重要位置。从最近的事态看，特朗普团队将很大精力投入到俄乌冲突的停火斡旋上。当然，无论“特朗普新政”成败如何，一旦特朗普腾出手来，就会对华全面施压，这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方案的关键一环。

经贸问题仍居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核心地位，未来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斗争将更趋激烈。再度执政的特朗普不断利用关税向他国施压，直至2025年4月2日对其他国家采取“对等关税”，从而拉了解构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的帷幕。作为当今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直接对垒，双边关系急转直下。特朗普重利轻义，侧重从经贸视角看待中美关系，强调使用关税手段来对华极限施压、倒逼制造业回流。贸易赤字、市场准入、投资优惠、供应链安全等都是特朗普尤为关心的对华经贸议题。

一旦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问题上没有能够逼迫中国让步、兑现实际利益，那么特朗普政府肯定会在诸如政治、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加大对华施压，中美战略博弈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政府推崇“丛林法则”，消极对待全球治理，不愿承担国际义务，单边主义倾向突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空间受到压缩，势必对中美关系稳定构成一定冲击。

^①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 访问时间: 2025年4月17日。

“特朗普新政”给中美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也给中国拓展战略与外交空间带来难得的机遇。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正在颠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构建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宣告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进而限制了特朗普的政策抉择。就整个国际大格局来讲，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是客观事实。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美国与盟友及伙伴之间的互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特朗普决策的模式、过程和效果。

“特朗普新政”无助于弥合美国内部纷争，反而会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激化党派之争和社会矛盾，“两个美国”的现象将更加突出。特朗普团队大量裁减政府人员，还宣称要将美国政府机构从现在的 425 个裁撤至 99 个。大幅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全球媒体署、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多个机构，加上美国和盟伴国家之间的分歧加大，西方对华遏制统一阵线出现裂痕，中国承受的地缘政治压力或有所减缓。“美国优先”大行其道将使得美国与盟伴之间的关系貌合神离，同盟内部离心力上升，美国对华统一阵线就会出现松动。新孤立主义情绪进一步抬头，美国主观上不愿投入更多资源，客观上左右世界的能力相对下降。美国更多关注国内议题，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和作用衰减。这就给中国进一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了机会。美国不愿承担国际义务，不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全球领导力必然下降。中国则可以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深化与“全球南方”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与美国漠视全球治理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国际上赢得人心。特朗普政府秉承“美国优先”理念下的举措将推动相关国家调整对外政策，甚至向中国靠拢。特朗普对外决策或多或少带有随意性，政策缺乏连贯性，缺乏系统性规划。中国宜抓住机遇，积极塑造，内外兼修，引导局势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对内，中国可以加大改革力度，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不断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对外，可以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投资和人才，结合“一带一路”不断拓展海外市场。未来五至十年尤为关键，中国要想办法做好自己的事。总而言之，中国可以我为主，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以斗争促合作，妥善处理对美关系，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创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世界政治视角下的特朗普回归与大国关系新动向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教授)

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以来, 美国对外战略发生重大转向。无论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发动的全面关税战, 还是他对俄罗斯的殷勤、对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盟友的威胁与羞辱, 以及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令欧洲震惊的演讲, 都充分展示出特朗普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塑造下的全球秩序嗤之以鼻, 彻底否定了二战以来美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方略。从传统国际关系的角度看, 这是在“自毁长城”般地摧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我们或许可以从世界政治角度出发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作出解释。

(一) 以世界政治视角解读大国关系变化

还在延安时期, 中央文件便使用世界政治这一概念。建国后我们以苏为师引入国际政治概念, 改革开放后又引入国际关系概念。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通常都是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分析框架, 而世界政治则打开了各国的边界, 以整个世界舞台上的政治斗争为观照和研究对象。如果站在传统国际关系的角度, 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美国力对比变化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 以及冷战时代延续下来的俄罗斯同北约的地缘战略对抗; 但如果站在世界政治的角度看, 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阵营同(基督教)右翼保守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融合了改良社会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主导意识形态, 代表全球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推动全球化的狂飙突进。但是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他们推出的“普世价值”“政治正确”和“觉醒文化”越来越与世界各地民众脱节, 而原本存在于“全球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巨大财富鸿沟, 也因为跨国投资和贸易的发展而被逐步内化进各国社会内部, 因此各国人民日常所能感受到的贫富分化大大加剧, 上述两者的共同结果是世界各地民粹主义思潮的汹涌上升。

而在美洲和欧亚大陆上，泛基督教阵营就成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民粹势力的幕后跨国网络。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日益增强，双方冲突逐渐升温。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传统社会伦理的颠覆与冲击，包括极端女权问题、性少数权利、极端动物保护、环保与气候议题、开放移民问题、种族平权问题等等，这些议题与泛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价值观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特朗普的再次当选褫夺了美国盟友体系内部协调最后的体面，将这一“文化战争”堂而皇之地摆在了国际政治博弈的台面上。在上述世界政治的光谱上，特朗普和普京同属于基督教保守主义一方，欧洲的许多右翼政要，比如匈牙利的欧尔班、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梅洛尼、德国的魏德尔也在其列；而美国的民主党、“深层政府”、欧洲主流的建制派政党则属于光谱的另一方。两个跨国阵营之间的矛盾如此之深，以至于一位来华交流的欧洲右翼政治家私下表态：“双方无法调和、无法妥协，最终只能用暴力解决问题”。

如果说 2008 年是全球化浪潮的巅峰时刻，此后新自由主义由盛转衰而趋于退潮，那么拜登政府的四年其实是美式全球化的回光返照。从 2025 年起，新自由主义思潮进入了加速下跌的新阶段。从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看，上一次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调整期是 1914 ~ 1945 年，通过三十多年的剧烈冲突和贸易斗争，最终形成了二战后地缘政治上的雅尔塔体系和国际经济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那么本轮逆全球化周期将持续多久？由于 2008 年以来的国际冲突“应力”释放比较缓慢，我们估计恐怕得比上一轮的三十年更长一些。

（二）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

如何在当下的世界大变局和政治大乱局中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与发展利益？由于西方深陷“文化战争”的冲突漩涡，新自由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裂痕为我国创造了战略空间。有趣的是，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其实处于一个左右逢源的独特位置：在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市场开放等领域，中国与美欧建制派阵营存在共识；而在尊重常识、维护传统文化、重视大众利益等维度，中国又能够与右翼保守主义者形成价值共鸣。这种特殊地位，恰恰可以作为中国突破西方围堵的战略支点。过去，在高瞻远瞩的“韬光养晦”战略驱动下，中国适度超脱于国际地缘斗争之外，为国家实力的积蓄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与空间；当下，中国又得以超脱于西方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文化战争”之外，以国家现实利益为导向，平衡两大跨国阵营，争取最为有利的国际格局。

特朗普第二任期引动的国际政治大变局，于我国而言虽有挑战，但主要是机遇。就目前来看，中国需要稳住俄罗斯、拉近欧洲、加码对美斗争。

第一，稳住俄罗斯。在美帝国体系尚未崩塌瓦解的前提下，中国仍然需要长期拉住俄罗斯，确保其不倒向西方阵营，避免重蹈 20 世纪后期苏联的地缘政治覆辙。我们对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应抱有信心，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的缓和还不至于动摇中俄关系。就俄美关系来看，经历数次欺骗与羞辱后，俄领导人对西方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就中俄关系来看，中俄两国在地缘政治、经济与能源安全等领域结成了事实上的“背靠背”关系，元首外交仍将发挥中俄关系“指南针”和“定盘星”的重要作用；从美国内政上看，其政策稳定性值得怀疑，外交路线仍存变数。只要民主党在 2026 年中期选举中夺回参众两院任意一院，美俄两国的合作便会困难重重；如果在 2028 年，民主党重掌政府，那么四年内俄美两国的一切交易都会反噬俄罗斯自身。但考虑到俄美关系缓和带来的潜在不利因素，中方应给予俄罗斯明确的战略信号：第一，向俄罗斯重申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可逆性，指出任何动摇该框架的行为都将导致两国的双输局面；第二，向俄罗斯明确表示，美俄关系的缓和绝不能以损害中国主权安全、侵蚀中国发展空间、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为代价；第三，主导完善中俄对美政策协调的机制安排，实现事前“交底”，事后“通气”，规避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战略误判。

第二，拉近欧洲。特朗普的当选为中国提供了改变中欧关系现状的战略机遇。俄乌冲突对欧洲地缘安全格局的冲击，引发了欧洲各国强烈的安全焦虑。欧洲政界采取“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思维，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导致中欧关系急剧恶化。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让欧洲诸国大跌眼镜的演讲，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对欧洲的藐视，特朗普总统发动的无差别关税，都有助于推动欧洲外交政策从盲目的“价值观外交”向现实主义回归，使其从实际利益角度出发，重新调整对华策略。中国可以把握这一战略窗口期，改善中欧关系。比如，中国可以利用新能源产业的比较优势与欧洲各国环保转型的迫切需求，提出“绿色马歇尔计划”，即以人民币计价的欧洲特别国债和由中国政府和相关产业共同设立的能源转型基金为基础，对欧洲新能源产业进行千亿级规模的投资，辅以外交攻势，在增强中欧战略互信、经济往来与相互依赖的同时，又可以对欧洲的“右翼风暴”形成阻遏，对冲欧洲民粹势力扩张的风险。未来，如果美国建制派重新上台，中国政策可再作调整。总之，只要美国、欧洲

分别由右翼民粹主义与传统建制派掌权，美欧之间的隔阂就会不断加深。

第三，积极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特朗普的上台对华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意图以战略收缩来使美国集中资源在亚太与中国对抗，并通过关税壁垒、技术封锁等手段对华极限施压；另一方面，特朗普又在解构其盟友体系、瓦解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推动帝国权力“去杠杆”，这将系统性地削弱美国霸权的根基。把握其行为特征尤为关键：特朗普兼具强权崇拜与务实主义倾向，既崇拜强国、鄙夷弱国、倾心新时代的“大国协调”，又具有高度的可交易性，不搞意识形态主导的“价值观外交”。近期，中国的外交表态精准契合与之博弈的最佳策略，即“以斗争求和平”，从实力角度出发，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并谋求与特朗普政府可能的谈判与交易。

俄乌冲突改变世界格局

田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2022 年俄乌冲突是战后国际秩序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表明后冷战时代西方集团的扩张势头遭遇到巨大阻力。2025 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回归单边霸权主义，自我否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趋势不断加强。这场深刻的变局标志着战后被冠以“雅尔塔体系”的世界格局已经彻底终结，世界多极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俄乌冲突虽然尚无止期，但是俄罗斯和北约都已遭受重创。一方面，俄罗斯陷入难以摆脱的全面战略困局。经济上，俄欧能源和经贸合作已经基本中断，俄罗斯经济重心转向东方和“全球南方”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面临明显的结构性困难。政治上，俄罗斯已经被欧洲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欧俄互信很难修复。安全上，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使俄罗斯西部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乌东部地区停火困难重重，消弭俄乌两国之间的矛盾更是无从谈起。同时，俄罗斯对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也在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北约在俄乌冲突中也暴露了军力衰

弱和内部矛盾尖锐的真相，把“纸老虎”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三年持续军援乌克兰不仅掏空了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家底”，而且形成了“激进反俄”国家从“道德”上压制其他国家的局面。军力虚弱和立场强硬使得北约欧洲盟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进退维谷，严重降低了北约共同防务的威慑力。特朗普上台后作出强制盟国提高军费、把俄乌冲突“烂摊子”甩给欧洲盟友的姿态，与上述北约结构性困局相比其实倒未必是弱化北约的决定性因素。

俄乌冲突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欧盟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变化。德俄能源合作被完全切断，不仅对德国工业是“釜底抽薪”般的打击，而且冲击了以德国经济为龙头的欧盟经济结构，欧洲经济多极化趋势已现端倪。值得注意的是，西欧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增强，并不意味着欧洲把自己完全限制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相反，由于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未来欧洲在经济上推进多元国际合作的动力始终存在，而这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二是欧洲自由派政党与以特朗普代表的西方保守派之间的斗争长期化。特朗普上台后，欧洲在继续军援乌克兰、反对“对等关税”和承认巴勒斯坦国等问题上表现抢眼，俨然成为后拜登时期西方自由派的堡垒。由于欧洲国家反极右翼的政治防火墙难以破除，以法国国民联盟和德国选择党为代表的欧洲保守派民粹政党很难上台执政，而这对未来西方政治回归自由派“正轨”埋下了伏笔。三是欧盟内部权力格局发生变化。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由于得到自由派支持，即使在美国保守派的压制下也依然强势。激进反俄的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和北欧国家在“政治正确”加持下对欧盟决策保持着较高的影响力，法国、德国要发挥领导作用只能采取与这些国家一致甚至更加激进的反俄立场。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不能指望欧盟降低与俄罗斯关系的对抗性。

上述结构性变化将对世界多极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欧美关系疏离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目前，欧美关系陷入二战后前所未有的低谷，自由派掌控的欧洲只能寄希望于美国自由派重新上台执政，在此之前只能靠“抱团取暖”熬过严冬。但是，特朗普以很大优势赢得大选说明美国保守派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实，欧洲如果没有“政治防火墙”的作用，恐怕很多国家的保守派政党也已经上台执政了。由于欧美政治制度的这种差异，未来双方关系始终会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欧美之间的战略互信恐怕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第二，欧俄关系很难转圜。俄乌冲突最大的地缘政治结果是欧洲成功地把俄罗斯塑造成了自己的敌人。无论俄罗斯原来多么渴望实施欧洲化，现在都已经成为多数欧洲国家的

假想敌，而这是俄罗斯无力改变的。对欧洲而言，最大的危险是这种变化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判断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欧洲振兴经济的发力点很可能放在军事工业上，而这这对欧洲和世界而言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欧洲需要严肃看待再度沦为世界大战发源地的风险。第三，美俄关系将始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上台后努力促成俄乌停火，俄美关系明显回暖，但实际进展不大。其实，并不是俄乌双方不想给特朗普“面子”，而是因为俄乌冲突已经形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在关乎政权合法性的领土问题上，俄乌双方都没有让步的空间。对俄罗斯来说，美国“劝和促谈”当然好过“递刀拱火”。但是，美国改善与俄罗斯关系意愿的稳定性和战略执行力都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因此，未来美国和俄罗斯建构具有坚实战略互信基础的合作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上述变化可以看出，西方集团通过孤立中国和俄罗斯制造“新冷战”的图谋已经基本宣告失败。新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变乱交织的多极世界中重要的确定性因素。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稳固，保持着迅猛的发展势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出现了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的新战略机遇期，中国甚至可能成为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未来稳定关系、增强合作的重要桥梁。目前，美国面临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压力，以至于特朗普政府推出单边霸权主义的“对等关税”方案，不惜以摧毁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为代价实施自救。可以说，美国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对立面。但即使如此，中美之间避免对抗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正确选择，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建构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环境永远是挑战与机遇并存，需要我们保持战略自信、提高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耐心，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多极化时代的正确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 聂侯诚）